

# 经典·翻译·辩读

——第七届“神学与人文学”  
暑期国际研讨班会议综述

Translating Classics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  
Review of the 7<sup>th</sup>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高志强

GAO Zhiqiang

作者简介

高志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GAO Zhiqi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dr\_gao@163.com

**Abstract:** The Seven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 Humanities 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August 3 – 7 2011. This Summer Institute was co-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The theme of the 7th Summer Institute was “Translating Classics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 Nine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lavic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Zurich,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he Taiwan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 Taiwa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n Australia attended the Summer Institute and gave lectures to you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as well as students from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out forty young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China submitted paper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Summer Institute.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f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the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main theme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mmer Institute.

**Keywords:**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translating Classics; Scriptural Reasoning; summary

2011年8月3日至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协办的第七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1位著名学者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青年学者与会,围绕着“经典翻译与经文辩读”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耿幼壮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讨班,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应邀致辞,并就会议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此次共有9位学者作了大会主题发言,他们分别是:斯洛伐克科学院高利克(Marián Gálik)教授、瑞士苏黎世大学韦宁(Ralph Weber)高级讲师、牛津大学/东京大学恰德(Robert Chard)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台湾大学林鸿信教授、“台湾中原大学”曾庆豹教授、美国贝勒大学丹尼尔·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教授、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罗兰·玻尔(Roland Böer)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与会的大部分青年学者也提交了自己的研究论文,并参加了分组讨论。

本次研讨班的9位主题发言人来自不同的机构,发言内容也涉及到不同的领域。概括而言,9位学者的发言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经典与经文辩读,《圣经》翻译与文化互动,中西经典与近现代思潮。与会青年学者亦在分组讨论中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并就上述问题予以了热烈的回应。

## 一、中国经典与经文辩读

“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本是同属亚伯拉罕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献研读和思想对话。学者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

何一种独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慧林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课题的主持人,近年来与西方学界展开合作,力图使“经文辩读”突破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献的原有局限,借助传教士所译介的中国经典以及大量注疏,使之真正成为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在本次国际研讨班上,杨慧林教授作的《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的翻译》的讲演延续、深化了这一研究思路。他认为对不同宗教传统的经文进行“辩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自我反省,而不同传统在其中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构的自我理解,对于当今世界可能尤为重要。但“向所有人以及所有的文化、宗教……和生活领域敞开”的“经文辩读”是否能够突破亚伯拉罕传统,从而实现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呢?杨慧林教授相信传教士,特别是理雅各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为中西之间的“经文辩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sup>①</sup>。

身为汉学家/传教士的理雅各虽然希望借助中国的材料解释中国的经典,并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践行了这一理念,但在他的翻译和理解活动中,其基督教背景还是清晰可辨的。杨慧林教授从理雅各对《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翻译阐明了理氏翻译的侧重点是使孔子的教导与耶稣基督的圣训相互呼应;而他对《道德经》的翻译则构成了《圣经》与中国经典之间的“辩读”,期间不时显露出的基督教“前理解”及其与老子思想的潜在关联,的确体现了中西文化相互诠释的可能。

理雅各基于自己的理解背景为译文所作的大量注释,不仅为中西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直接线索,也使我们得以窥见西方人究竟如何面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杨慧林教授认为“如果我们能借助这些被普遍接受的译本去回应某些人对中国的误解或

---

<sup>①</sup> 理雅各的翻译活动几乎覆盖了所有重要的中国古代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选集》和《离骚》等。他“是把所有儒学经典翻译成非亚裔语言的第一个非亚裔人”。(张西平、费乐仁语)

者‘妖魔化’，显然也更具说服力。”

随着世界对中国的更多关注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在要求，近年出现了中国古代经典外译的新一轮热潮，杨慧林教授认为“重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前提，似是认真整理已有的历代译本，特别是那些研究性译本的相关注疏。由此才能直接切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就此而言，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注读无疑都是绝佳的案例。这些中西“经文”之间的互译、互释、互训的实践可能会达成一种“非中心”（decentred）或“解中心”（de-centered）的“真正的思想”，而这正是包含在“倾听”和“回应”的对话关系中的“经文辩读”的根本命题。

瑞士苏黎世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韦宁“追随杨慧林教授的研究方向”，但将重点放在儒家学说上，考察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经文辩读”的好案例。他将“经文辩读”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第三个层次的目标是发掘亚伯拉罕传统之外的价值，韦宁认为“这比仅仅逆转迄今为止尚无效果的学院派的信仰间对话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此意义上，“经文辩读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价值，甚至是对全人类命运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神学词汇发出了最强音”。

韦宁博士通过考察英语“scripture”的演变，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类似……圣经之经文功能的文本，在“某些语境”中，scripture 可以适用于儒家的“经”；而在考察汉语“经”的发展过程后，他认为中文的“经”字实际上在正典化的过程中……确认了一个不同的权威……使它最终成典；“与正典相关的权威性可能会形成一个 scripture 与‘经’的共同基础”。韦宁用一种逻辑学的方式表述了他对这两个词语关系的看法，即“所有的 scripture 都是经，而并不是所有的经都能成为 scripture”。由此对参与“经文辩读”的儒家学说来说，“经”应该在一个相对狭义的、接近“经典”意义的基础上理解和运用，同时还须是确然具有宗教特点的儒家典籍。韦宁的结论是“儒家学说需要首先进行重新包装才能参与到‘经文

辩读’中来……作为宗教的儒家学说本身可能会因此而超越‘经文辩读’的语境而得到更多的认识”，但绝不应该成为任何形式的“亚伯拉罕式儒学”。

来自台湾大学的林鸿信教授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为中西“经文辩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林鸿信教授认为基督教信仰主张天与地同为被造，天地相连为最高理想，“天”一方面代表了上帝，一方面从感官所见之天转成上帝真理的义理之天。天虽然高不可攀，却有对人开放的可能，强调的是天对地以及居住地之人的开放性，呈现出一种人世的人文精神。而中国传统的“天”有“自然天”、“义理天”与“神性天”之分，其涵义从宗教、政治而逐渐转向道德的强调，这成为中国哲学的特质。相比较基督教强调“天对人的开放”，儒学比较强调“人对天的开放性”，林教授认为这样一种由人而天又由天而人，且由天而人又由人而天的回环可成为儒学与基督教进行经文辩读的思考方式之参考。

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的罗伯特·恰德通过研究理雅各对“礼”的理解和西方学界近期一些对“礼”的研究，认为西方知识界对于“礼”的理解，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西方知识结构的制约或影响，这既可能造成曲解，也可能带来新的视角与启迪，从而丰富和深化对“礼”的研究。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的管恩森通过追溯中西“经文辩读”的历史实践，从理论层面阐释了中西之间“经文辩读”对于当下人文学科的跨文化对话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启发与实践价值。中国人民大学赵惊、高志强则通过对理雅各翻译的《道德经》和《论语》的分析，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中西之间“经文辩读”的可能。北京华文学院的成盈秋以“将”的翻译及其语法化为例，从共时变异与历史发展两个角度，试图探求翻译经典著作中语法化等级较复杂的高频词的合理途径。

## 二、《圣经》翻译与文化互动

《圣经》作为西方世界的基本“经典”，在传统意义的“经文辩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代以来，《圣经》的中译与中国经典的西传过程可以说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翻译活动对于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构的自我理解，都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

美国贝勒大学宗教系的丹尼尔·威廉姆斯教授在此次研讨班上作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希腊智性文化的修复》的报告，重点讨论了古代希腊文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复杂关系。在讲座中，威廉姆斯教授论述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化。他认为在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诠释者将古代犹太教、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视野融合起来，表达了共同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理念。最为突出的就是教育（*paideia*<sup>①</sup>）的形成和对美德（*virture*）的追求。

来自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曾庆豹教授从“解释主权之争”的角度，重新阐发了基督教遭遇中国古代经典，在中国进行传播时所引发的“译名之争”。他在《明末天主教的译名之争与经文辩读》的报告中谈到“礼仪之争”是一个与“本地化”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对外来宗教来说，一旦援用了在地化的资源，其“正当性”就永远成了话题。“‘礼仪’不过是一个表现系统，其真正涉及的……仍然是‘天主’或‘上帝’（即 *Deus*）代表的意义……（经过翻译）产生了怎样的关系变化和冲突”。曾庆豹教授“将礼仪之争的问题锁定在‘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上……涉及的正是‘翻译’的政治神学问题：究竟谁拥有‘翻译（主）权’”。因此“译名之争”所涉及的经

① *Paideia* 几乎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理想，在这个意义上，*Paideia* 可以定义为希腊教育的理想和目的，是为教育过程的终极目的所提供的优雅、美德、高贵和巧妙的混合物。（陈恒语）

文辩读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经典以及对它的解释问题。

曾庆豹教授讲到明末儒者王启元对天主教掀起的“译名之争”极为重视,他意识到天主教的“经文辩读”会造成“斥小中国之儒宗,混淆上帝之名号”,因此要“尊上帝以辨天主”,并提出以“儒教的三位一体”(上帝、孔子、皇帝)对抗天主教学说。曾庆豹教授认为王启元的“译名之争”已非天主教教派内部之争,而是“跨文化/文本/宗教”的政治神学之争。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引经据典,想通过经文辩读确立六经的上帝与天即意指最高主宰,天主即上帝,“特异以名也”。曾庆豹教授认为当“利玛窦决定以‘上帝’来翻译 Deus 时,其实是表达了以‘我们的概念’来‘解释原作’的想法,这样‘解释原作’就更多的成为一种发明而不是一种发现”。

钟鸣旦曾指出“译名之争”的诠释学问题,即在于究竟如何看待“原典(原儒)与注疏(后儒)之间的关系。耶稣会士龙华民在《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中表示当以“上帝”来翻译至高神时,对中国的注疏者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对于“上帝”的种种解释,将影响或渗透人对天主教至高神的解释。曾庆豹教授认为以往“学界对于‘译名之争’的讨论,大都夸大了龙华民与利玛窦之间的对立,……龙华民之所以成了众矢之的,当然与莱布尼茨反驳龙华民的效应有绝对的关系,……多数论者……支持莱布尼茨并同情利玛窦且靠向中国,……政治神学的意味极为鲜明,……而这正是‘译名之争’的‘经文辩读’的真正问题所在。”

在《圣经·旧约》诸部分中,《雅歌》也许是在中国阅读和翻译最多的。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部教授高利克在《圣经中文翻译(1919-2004)中的书拉密形象》的报告中,比较了《官话和合本》(1919),《歌中之歌》(陈梦家,1932),《新旧约圣经》(吕振中,1970),《圣经》(思高版,1968,1992),《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现代)和《新译和合圣经》(新译,2004)这六个版本的《雅歌》中唯一有名有姓的女性形象——“书拉密”在不同中文译本中的差异。



高利克教授发现《和合本》与《新译本》的译文是极为相似的,大体上只是格式的变化,而陈梦家的翻译更加文学化,最富有诗意。总的来说,这三个版本的“译文都具有简洁的特点,与原始文本非常接近”。不过,天主教思高版圣经“突出忠实性和易懂性”,该版本“追溯原始文本”并采用“简洁优美的国语进行翻译”。而《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遵循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原则,强调“信息在译入语使用者中的可交流与可理解性”,将旧约与新约译为当代中国读者可以理解的经文,最具有当代特点。《现代中文和合本》虽然在序言部分批评了《官话和合本》,但高利克教授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看到它还是基本遵循了经典的《官话和合本》。

通过翔实的文本分析,高利克教授认为,由于经典《圣经》译文的新版单卷本在中国销售影响较广,具有更高的利润,所以出版商热衷于不断推出新译本,“被认为是上帝之言的《圣经》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此外,一些与会的青年学者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异质文化间有关宗教翻译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的宋旭红从文化互释的角度阐述了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而该政策的最终成与败则提示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的王鹏分析了李提摩太受其传教士身份的限定,在翻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经时有出明显的基督教化倾向,表现出有意、无意的文化误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的何广顺在中文语境下重释了《约伯记》,认为其伟大智慧就在于它始终探讨着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有限的人如何在现实性的遭遇中走向无限者和绝对者,如何从世俗走向神圣,如何从人间走向上帝。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靖从“古老的智慧”入手,对圣经《箴言》中的“外女”(foreign woman 或 strange woman)形象进行了新的诠释。

### 三、中西经典与近现代思潮

经典之价值,不但在于其典范性和权威性,更在于其历久弥新、生生不已的意义和智慧。中西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不断注目于经典,返回到经典,从中汲取不竭的思想资源。

现代新儒家“开宗大师”熊十力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1949至1951年),先后刊印了5篇文献:《十力语要初续》、《韩非子评论》、《摧惑显宗记》、《与友人论张江陵》和《论六经》,这些文献皆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五卷。一般而言,熊十力被认为是一位阐扬体用不二、明心见性的典型的哲人。但在此次国际研讨班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刘小枫教授在《熊十力如何读六经》的讲座中,带领与会青年学者细读了熊十力先生的《与友人论六经》,提出“深究唯识、弘阐《大易》《春秋》微言的十力儒学,绝非空玩心性之学,而是有着深切的政治关怀——十力先生不仅是形而上学大家,也是政治思想大家”的观点。

刘小枫教授认为《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比其它各卷更为全面、集中地反映了十力的思想”,其中《论六经》一文是“十力对自己一生志向和思想的概括性自我阐述,……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行动,……为我们把握十力先生的立志以及一生中诸多‘直凑单微’的授学讲记和语录提供了纲要,……以‘论六经’为题,为何和如何为学就具体化为为何及如何阅读我国古传经典。”

熊十力所处的时代正逢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伟大变革时机,他“感世变益剧,哀思人类”从而走上形而上学之路,试图以自己的学述力挽“耽空溺寂之颓流”。刘小枫教授认为正是经过形而上学的“一归於己之所实参冥会”,熊十力才得以从一位普通革命者脱胎为伟大的革命家:从拿枪的革命人成为思想的革命家。

把“列宁”和“基督教福音书”放在一起,对一个平素对宗教、基督教神学和圣经关注甚少的人来说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来自澳

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罗兰·玻尔教授通过详细分析列宁运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关组织的比喻，即《马太福音》第13章中有关“杂草”(tares)的比喻。他发现福音书的确在《怎么办?》(1902)甚至列宁的所有著作中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此次《和列宁一起翻译福音书》的讲座中，玻尔教授发现列宁在《怎么办?》中多次引用“杂草”这个比喻来“重新思考共产党(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结构，特别在需要分辨力、有活力的公开讨论及辩证地看待非法与合法组织关系等方面”。

玻尔教授最后总结道，列宁解释和翻译福音书的过程，使得这些故事和比喻本身变得更激进了，也使得聚集在福音书周围的“信徒”(社会主义者)变得越来越激进了，这些都使福音书信息变成了变革的革命信息，从而转变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坐标。正是列宁的解释揭示出了这些比喻内在的范畴。

近20年来，西方学界对保罗的研究构成了一场保罗复兴运动，宁波大学中文系的葛体标认为阿甘本的《剩余时间：〈罗马书〉评论》与齐泽克、巴丢等人不同，他延续了本雅明、陶伯斯的思路，提出了剩余时间的主旨，是一种对《罗马书》的弥赛亚主义的读法。湖南女子学院外语系的罗艳通过分析兰斯顿·休斯的短篇小说《让我奏响布鲁斯》，阐释了休斯文学创作的一个意图：以黑人的生存困惑提出“上帝在哪里”的诘问，从而质疑美国主流社会中宗教信仰的合理性。格拉斯哥大学批评研究学院的汪海认为不断生成的“他者”的“翻译”正是解放经典和经典解放“我们”的途径。

#### 四、研讨的其他问题

本次国际研讨班共收到与会青年学者的学术论文41篇，除以上三个方面的论题外，这些论文还涉及明清传教士研究(贾蕾、孙彩霞、黄芸等)，神学研究(张华、郑钰、李安、南宫梅芳、芮欣、殷振文等)，诗学与艺术研究(罗如春、赵山奎、杨道圣、萧湛、陈霞、江玉

娇、任裕海等),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陈瑞红、李志雄、陈秋红、张欣、刘丽霞、郭晓霞、刘燕、张艳萍、邓国琴等)、明清儒学研究(陈叙)和古典诗词英译研究(郑淑明)。在研讨班上大家发言热烈,互相辩论,磨砺了思想,交流了学术心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暑期国际研讨班成功举办再次表明,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语境已经使得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不但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而探讨中西经典在不同文化间的翻译将会帮助我们找寻这种对话的原则和基础,通过翻译可以从一种异质视角触动经典产生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又反过来启发翻译者反观自身的文化经典。这种平等而有效的对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他者”,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从而破除单一主体,形成由多元的“他者”共同参与的、寻求智慧的活动。